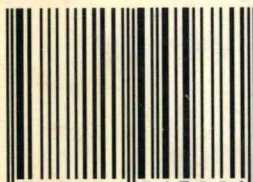


丛书题签 / 启功

封面设计 / 张彪

唐怡

ISBN 7-221-04588-7



9 787221 045881 >

ISBN7-221-04588-7

K · 419 定价：9.00 元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马骏骐·朱健华

译注

# 人物志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邛 生  
封面设计 张 彪 唐 怡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阳市市北路 68 号附 1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 6828993

## 人物志全译

马骏骐 朱健华 译注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8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 3000

---

ISBN 7-221-04588-7/K·419 定价：9.00 元

## 前 言

刘劭字孔才，三国时广平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人，约生于汉灵帝初年，卒于曹魏正始年间。初入仕途，为尚书令荀彧的门下计吏，东汉建安年间官拜太子舍人、秘书郎。魏文帝黄初年间，为尚书郎、散骑侍郎。魏明帝时，外放陈留太守。魏景初中，受诏为都官。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卒后追赠光禄勋。

刘劭通晓经学，“该览学籍，文质周洽”<sup>①</sup>，博学多闻，著述甚丰。入仕后，受诏集五经群书，参加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的编纂，并与庾嶷、荀诜等人一起，改定刑制，删约旧科，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撰《律略论》、《说略》、《乐论》十四篇，《都官考课》七十二条，著《法论》、《人物志》，另有《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凡所撰述百余篇，但其中大部分已亡佚，现仅存《人物志》一书及一些残文。

✓刘劭所撰《人物志》，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探究选材用人的杰出专著，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本人材学理论著作，在国外有较大的影响<sup>②</sup>。隋唐志均将此书列入名家。东晋十六国时，

---

① 陈寿《三国志·魏书·刘劭传》。

② 参见《未来的行政首脑》中译本(美)哈林·克里的序，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

敦煌学人刘昫重其书，始作注解。然刘昫所注，“不涉训诂，惟疏通大意，而文词简古，犹有魏晋之遗”<sup>①</sup>。〔唐〕刘知几《史通·自序》，〔唐〕李德裕《李卫公集·穷愁志》均有称述。此外，罕有论及者。〔宋〕阮逸惜其“由魏至宋，历数百载，其用尚晦而鲜有知者”<sup>②</sup>，故为之作序。然阮逸乃云得书于史部，则实不知本为魏晋形名家言。

继阮逸之后，王三省、郑旻亦作《序人物志后》、《重刻人物志跋》。宋庠也作跋并辨正了《三国志·魏书》刘劭名字应改“劭”为“邵”（可备一说）。文宽夫为《人物志》作了题记。据文宽夫题记可知，《人物志》在宋以前即有传本，北宋时又作刊定。明代时，有正德本、隆庆本，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万历本系万历甲申年间，河间刘用霖根据隆庆壬申郑旻旧版而修之刊印<sup>③</sup>。但《人物志》在其流传过程，“惟向无善本，所见丛书诸刻，类多讹夺，其中颇有僻涩之字，而又辗转乌焉，几不可解”<sup>④</sup>。当代学者汤用彤曾撰《读人物志》，阐述该书要略；冯友兰、牟宗三、钱穆亦有专文论之。美国学者西罗克（Shryock），则以《人类才能的研究》为题，于1937年将该书译成英文，刊行后，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任继愈先生根据上海涵芬楼影印明正德刊本，加以断句，于1955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惜未作校勘与注释。

刘劭生活在汉末至曹魏正始期间，其生活的早期，正是汉末建安前后的动乱时期。当时，天下纷争，群雄割据，各怀异志，虎视狼争。各派势力为争霸天下，各有其长远的战略，但都把拥有人材视为一个基本条件。诸葛亮在分析曹操击溃袁绍的原因时说：

①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十三，子部，杂家类一，《人物志》三卷。

② 阮逸《人物志·序》，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9月。

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三十五，杂家类一，《人物志》三卷。

“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sup>①</sup>对曹操“任天之智力”，凭靠人材取胜的战略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国之际，魏、蜀、吴三国鼎立，虽然就局部而言，各自内部逐渐形成了相对的安定局面，但就全局而言，仍是分裂对峙，战事频仍，动荡多事。人材问题是当时政治、军事斗争中的头等攸关大事。曹魏、刘蜀、孙吴为了谋得各自在政治、军事上的优势，莫不从各方面争取和任用人材。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说：“人材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sup>②</sup>对于各方的用人之道，赵氏又评述说：“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sup>③</sup>赵翼从人材角度分析三国终成鼎立的原因，是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由此可见，人材问题是充当幕僚角色的刘劭及其他效忠曹魏集团的封建士大夫必须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自春秋战国以后，诸子百家经过长期争鸣，各种学派逐渐融合，但认识并未真正完全统一，出现了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三”的局面。

汉代黄老之说与儒家思想相继占统治地位后，除了正统思想有较大发展外，其余各家学说亦有发展。尤其到了汉末，政治上的腐败及随之而来的动乱，统治阶级一时无心顾及对思想文化界的控制，同时由于现实政治的冲击，较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名教出现了新问题，于是，新观念、新理论、新争论，也就应运而生。

最初，一些比较开明有识的士大夫，针对时弊，发表了一些议论，提出了“循名责实”的主张，随之便逐渐形成了一种新思

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② ③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

想，把道家的自然之说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即“儒道兼综”的所谓名理学思想。到曹魏统治初期，形成了“名理之学”或曰“刑（形）名之学”。这样名理思想有了广阔的市场，为愈来愈多的封建士大夫所接受与奉行。像刘劭这样一生都处心积虑为曹魏政权研究和提供统治术的人，也就很自然地信奉了这种思想。

此外，两汉之时，为了察举选官的实际需要，人物道德性情的修养也就成为一种衡量选择人材的标准。东汉以后，随着察举选官制的没落，以及儒家思想衰微，本来内在的道德修养变成外在的装饰，成为一种“名色”，讲求所谓的“名节”。于是，由汉末到魏晋，在人物品评方面，便把才能看重在道德之上，衡量人物的标准从道德伦理转为才能性情，以至气度风神，才性鉴定也逐渐由评论实际人物嬗变为抽象理论的研讨。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刘劭撰述、创作了《人物志》一书。

《人物志》一书成书的时间，史料尚无具体、确切的载述，故笔者只能根据有关史料作一大致的估计。魏明帝景初中，刘劭曾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这是为曹氏政权制定考核官吏的办法与措施。可是在具体实施中，却遭致司空掾傅嘏等人的反对，指责其“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sup>①</sup>。这说明刘劭作考课法，意在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是依照官吏的品状来考核其才能的，其中必以人才学理论作基础。

而且，在此前的青龙年间，魏散骑侍郎夏侯惠在上表推荐刘劭的奏章中，推许他说：“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这也进一步表明，在魏青龙、景初前后几年中，刘劭对各类人材进行过较深入的专门研究，并为曹魏政权作了一些考察官吏的实际工作。其《人物志》一书，应当说就是在这些研究与工作基础上形成的。

<sup>①</sup> 《三国志·魏书·傅嘏传》。



魏废帝曹芳正始年间，刘劭专门从事于执经讲学，由于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讲学之余，他便归纳原来的研究，总结实际考察官吏中获得的识人、用人的经验，写成《人物志》一书。所以，该书成书的时限应为正始年间，而其形成期则是在曹魏政权的整个时代。

✓《人物志》有上、中、下三卷，十二篇，“极整万言”。刘劭继承了东汉以来品鉴人物的风气，以及适应“九品中正制”量材授官的现实需要，总结了前人有关考核、鉴定人物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并吸收当时的研究成果，跳出了就时政论时人而褒贬具体人物的窠臼，侧重于从理论上“述性品之上下，材质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贯于道”<sup>①</sup>，从人物外表的言语、体貌、行为等方面特征，系统地阐述了人材本质、人材分类、鉴别人材与用人的标准、原则等问题，从哲学、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识材用人之道。胡玉缙评述该书说：“《人物志》共十二篇，虽各为标目，而实一意相承，其旨主于别材器使，为名家之学，而推重术家之流……又言道之平淡玄远为极致，盖申、韩而参以黄、老，其中名言隽理，可味者多，文笔亦峻厉廉悍，在并时《申论》、《中论》之间较为简古……此与《文心雕龙》及《史通》并称谓三刘之书，最堪玩味，是也。”<sup>②</sup>

在《人物志》自序中，刘劭说：“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sup>③</sup>，开宗明义地点明了建功立业，安邦治国，知人为首务的观点。他以尧、舜、成汤、文王知人用贤的史实，进一步论证

① 阮逸《人物志·序》。

② 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三十五，杂家类一、《人物志》三卷。

③ 刘劭《人物志·序》。



了功业的开创、兴衰系于识材用人，若用非其人，则不能达到兴庶绩、成伟业之目的。所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而得人之要，惟在知人。“何世无才，患人不能知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sup>①</sup>在他看来，古代贤君圣主正是具备了这种敏于知人，慧眼识材的美德，所以才“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sup>②</sup>。睿智的君主，其首要任务是知人、用人，只要使各类人材充分发挥作用，各项事业就会兴旺发达。所谓“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sup>③</sup>，便是刘劭撰写《人物志》的宗旨。

既然人材问题关系到功业成败、庶政兴衰，那么人材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与秉赋呢？

刘劭认为：“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sup>④</sup>他推崇的所谓“中和之质”，是人材在基本素质上要具备不偏颇，也就是“中庸”。“中庸”本出于孔家之言，而“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则是刘劭用道家思想来解释儒家的“中庸”。“中和之质”实际上是老子之“道”。《老子·三十五章》载：“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刘劭所言“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即老子所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由其无味，故调成五材，此亦“道”“用之不足既”的意思。

坚持德、才标准，将德的标准放在首位，这便是刘劭的人材观。在《九征》篇中，他以儒道揉合的“中庸”为纲目，剖析了人们在基本素质上的悬殊，把人材分为“兼德”、“兼材”、“偏材”三类。他认为：兼德者，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的也，

① 《资治通鉴》卷十七。

② ③ 刘劭《人物志·序》。

④ 《人物志·九征》。

德行彰硕，堪称圣人，是君主之材；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德材兼备，其于中庸，虽“具体而微”，仍不失“大雅之称”；偏材之人，其“性不可移转矣，虽教之以学，材成而随之以失，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sup>①</sup>。所以，偏材者，其德与中庸无涉，其材却工于治事，只能名之为“小雅”。兼材、偏材由于不符合中庸，抗者过之，拘者不及，属于人臣之材。

刘劭不仅以上述理论作为鉴识人材良莠高下的标准，而且进一步阐明了这种理论，以此分辨君主与臣僚的才能。他认为，贤君良臣的区别在于，“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众材”<sup>②</sup>。也就是说，良臣的才能包括勤奉政事和指陈政务两个方面，必须具备各种具体的行为能力，并身体力行；而贤君的才能并不在于躬亲庶政，而在于役能使贤，驱驾英才，使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垂拱而治，兴庶绩之业。当然，刘劭所推究考察的重点不是君材，而是臣材。

在刘劭看来，君主与臣下的才能所以有上述差异，是因为君臣的基本素质大相径庭。君主具有“中和之质”秉赋，所谓“主德者，聪明平淡”，其德可及于“中庸”，是故，“主道得而臣道序”，一位睿智贤能的君主，独具慧眼，善于识别不同类型的人材，知晓各种人材的特点，取人之所长，避人之所短，量能授官，各尽其材。由此，他得出了“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的才能，舍贤君圣主其谁的结论。

诚然，《人物志》是以1700年前的政治标准与伦理道德来品评君臣才能的，该书借鉴总结前人成果时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触，它将儒、道、名、法、阴阳诸家思想融汇在一起用以批评观察人物，

① 《人物志·体别》。

② 《人物志·材能》。

目的是使君权神化，劝导曹魏统治者要通过玩弄权术，让臣下莫测高深，以达到固位保权、垂拱而治的目的。同时，通过明了君臣之别，妥善任用人材，并由此实现“大同”社会。这虽不足称道，但就作为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广博知识与良好品质和素质，善于把握大端而无需苛细，无需事必躬亲而言，无疑是有科学意义的。

既然人材是致安之本，那么人材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

《人物志》一开始就点明材与性同是人材的基本要素，同样影响人材的优劣，并且“性”质因素更为重要的观点。基于这种观点，刘劭提出了“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sup>①</sup>的主张。该书有不少篇幅阐述了人的性格问题，其中对性格特征与类型的利弊进行了深刻剖析，从多方面阐明“性”对材的形成与发挥所具有的影响。同时，还较具体地分析了“性”对人情感、动机以及行动的影响。另外，刘劭还认识到人禀性的稳定性，得出“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的结论。他还说明“材”与“性”的区别，“材”与“性”不仅内涵不同，而且来源也相异，一是学得，一是天生。当然，他这种“性不可移转”的观点，未免过于绝对，人的禀性固然不易改变，但也并非绝对“不可移转”，而且也并非只有“偏材之性”是如此，任何人的性格都一样，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刘劭不仅表明了他对材性关系问题的看法，而且还对人的本质与才能相互影响进行了阐述，即所谓“质于理合，合而有明”，“明待质而行”<sup>②</sup>，“夫质有至有违，若至（弗）胜违，则恶情夺正，若然而不然……是故不仁之质胜，则使力为害器，贪悖之性胜，则

① 《人物志·九征》。

② 《人物志·材理》。

强猛为祸梯”<sup>①</sup>。也就是说，“材”只有在好的“性”指导下，才能才可正当施展与发挥，否则，便会起坏作用。另一方面，“性”又必须借助于“材”，在实践行为中去体现，正如“以明将仁，则无不怀；以明将义，则无不胜；以明将理，则无不通，然则苟无聪明，无以能遂”<sup>②</sup>。

人材情性不同，情性之理又十分微妙，如何识别呢？刘劭从哲学的角度，阐明了人的性情与才能，是可以通过其外在的溢露而加以鉴识的。他说：“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sup>③</sup>。即是说，可以从人的体质、外貌鉴识人材。

刘劭继承了先秦朴素唯物主义阴阳五行的宇宙生成说，从总体上认为人是元气（“元一”）而生的，具体而言，人的质是由五种不同物质，即“五行”构成的。人们在禀气过程中所摄取的五种物质数量多少不同，便显现出不同的质，要想判断一个人的质，只需考察其所表现的气质。人的骨、筋、气、肌、血，是“五物”，即木、金、水、火、土之象。“五物之实各有所济”。骨直而柔叫弘毅，是仁之质；筋劲而精称勇敢，是义之决；气清而朗叫文理，是礼之本；肤体端而实称贞固，是信之基；血平而畅叫通微，是智之源。这种“五行”在人体表现出来的恒性，称之“五常”或“五德”。质、形的关系是质诚于中则形于其外，尽管人物形形色色，千差万别，体变乎穷，“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sup>④</sup>。

质、性是相互联系与依赖的，人“禀阴阳以立性”，阴阳即指元气所具有的“动”、“静”两种根本属性，人在禀气过程中往往表现为阴阳失调，惟圣人方可能“兼二美”，表现为“阴阳清和”，

① ② 《人物志·八观》。

③ ④ 《人物志·九征》。

因而性有“抗拘”不可避免，各种具体的性便同时兼有善和不足。

刘劭把人们情性的外在表露归纳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九个方面。“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怛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sup>①</sup>。这就是他倡言的“九征”，并认为只要通过对“九征”的观察，才可知晓人们材性的各自特点。

基于上述观点，他认为，兼德之人，具备“九征”；兼材之人，“九征”“具体而微”；偏材之人，具备“九征”之一；“依似”为乱德之人；“杂间”为无恒之人，是“末流之质”，不纳入人材系列，属于常人。

✓《人物志》在分析人的质、性、才、能及其关系时，摒弃了以往的“性善”、“性恶”、“性三品”之说，以古代“元气”、“阴阳”、“五行”之说为理论依据，建立了一套认识人材本质，识别人物的体系，这是刘劭的创见。

然而，书中倡言的“九征”之说，却有骨相学宿命论的色彩。尽管如此，其论述也不乏合理的成分。难能可贵的是，他认识到，物质先于精神，精神依据形体，由形质决定情性，人的精神活动是通过形体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的，这无疑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书中对人材情性的阐述，是以物质本原为基本出发点的，从而阐明由于素质上的差异，人材自然也就各异了。然而，刘劭太看重天赋素质及人的生理特征，其论证也较牵强附会。

在《人物志》中，刘劭极为推崇德及中庸、材兼诸流的全材，在他看来，“其为人也，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

<sup>①</sup> 《人物志·九征》。

怪，仪正容直……则纯粹之德也”<sup>①</sup>。然而，他并未因此偏执一端，否认贬斥那些“九征有违”偏杂之材的长处。

由于刘劭认为人材的基本构成包括材、性两个方面，所以，他对于人材的具体分类，也就包括两类方法。

其一是根据性格和气质情况来划分。首先，根据其质“中庸”或是“拘抗违中”，而把人材分为一种具备“中庸之德”无所不通、无所不能的人，以及强毅之人、柔顺之人、雄悍之人、惧慎之人、凌楷之人、辩博之人、弘善之人、狷介之人、休动之人、沉静之人、朴露之人、韬讷之人等十二种有所长、也有所短的人。此外，又根据“性有九偏”，“情有九偏失”，把“偏材之人”分为刚略之人、抗厉之人、坚劲之人等九种。同时指出，“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杂”，也就是说，具体情况多种多样，并不只局限于此，所列举的只不过是典型代表而已。他从性格角度划分出的上述两个体系，虽然具体类别略有不同，但仍属于同一分类方法。

其二是根据所具备的德、法、术“三材”的不同情况，即“三度不同”，而分出全能的君主和十二类人臣之材。这十二类人臣之材是：清节家，德行高妙，师氏之任，可以掌管教育；法家，建制立法，强国富人，司寇之任，可掌刑法；术家，睿智善谋，可掌以庙谟；国体，德、法、术皆备，辅弼之材，三公之任；器能，三材而微，善理庶务，冢宰之任；臧否，能明辨是非，师氏之佐；伎俩，工于技巧，司空之任；智意，通权达变，司空之佐；文章，能属文著述，国史之任；儒学，能传圣人之业，安民之任；雄杰，胆力绝众，权略过人，将帅之任。上述十二类人臣之材中，刘劭尤为推崇国体之人，他认为，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材之雋也”<sup>②</sup>，可任宰相之职，辅佐人主。

① 《人物志·九征》。

② 《人物志·材能》。

此外，刘劭还从“聪”、“思”、“明”、“辞”、“捷”、“守”、“攻”、“夺”等方面对才能进行分类，把人材相应地划分一种“兼有八美”的通材之人和八种“适有一能”的偏材之人。

刘劭虽然把人材分成了“兼德”圣人、“通材”、“偏材”三种，但实际上只是作为君主的特殊人材和作为“人臣”的一般人材两类，而他的侧重点只是后者，也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实用型偏材和各种专门人材。根据他那种一般人的性情、才能都难免有所偏失，只有圣人才能至善至美的观点，他对圣人以外各种性格类型人材的具体分析，事实上也就几乎包括进了所有的人材。

必须指出的是，他所阐述的问题，正是现代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的基本内容，也是现代人才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因而，他在这方面的一些观点与认识，我们今天仍可借鉴、参考。虽说他没有进一步进行综合性研究，而且所分出的各个体系也都尚不很全面，但他在实际上注意到了用各种分类方法，可能更有利于从各方面去说明所要阐明的问题，从而达到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人材的目的，在主张重德的前提下，强调了才能的重要性。而且，刘劭所分出的人材类型及其分类方法本身，在我们今天对人材的开发、利用中，仍不乏可借鉴、运用之处。

为了进一步探究人材的内涵、《人物志》中专门辟有《英雄》篇，对“英雄”这一辞一析为二，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刘劭说：“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sup>①</sup>他认为，凡具备了“英”或“雄”这类素质的人皆可以称为“材”。

那些“文武茂并”，可能包括能“成大业”的帝王之材在内的“英雄”人物，就总体而言，当然都是层次较高的人材。然而，特殊之中又包含一般，所有这类人材，又包括英才、雄才、英雄三种。

<sup>①</sup> 《人物志·英雄》。



从大体上而言，“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sup>①</sup>。倘若是“聪能谋始，明不见机”，那么就只“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不能称为英才。若是“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那么也只“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也就不成其为“英”。只有“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要是“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那只不过是大力士罢了，先锋都不能充任。要是“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也只能充任先锋，成不了将帅，更遑论称之为雄。所谓“雄”者，必须是力、勇、智三者兼备。

然而，无论是“英”才，还是“雄”才，仍均属于“偏至之材”，只能像清节家、法家、术家、骁雄一样，充当“人臣之任”，或将或相，韩信、张良即是也。

刘劭认为，历史上凡能开创帝业，成就大功的贤君圣主，一般都兼有“英”与“雄”两个方面的素质，乃能役英与雄，而且，能成大业的君主所具有的“英之分多于雄”。如果是“英”的素质少，“则智者去之”。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结果垓下之败，自刎乌江；刘邦则“英”的素质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两得其用”，所以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

概言之，《人物志》中的基本政治观，是明君贤臣政治观，把一切实现理想社会的希望都寄托在创“大业”的“英雄”或能臻太平的圣主身上，希望有一个兼备英质与雄分，“能役英与雄”，同时其质又“中庸”、“平淡”、“兼德”的圣人来一统天下，通过选择和任用各类优秀人材，从而创建太平盛世。

既然人世间“群才各异，志各异归”，那么知人识材的具体方

<sup>①</sup> 《人物志·英雄》。

法与途径是什么呢？

鉴定人物材、性的各种方法和途径，在《人物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刘劭虽然赞美兼德、兼材之人，但在实际运用中，主要是偏材。论证鉴识人材时，刘劭提出了“八观”之法。“八观”之法是从观察人物的感情、行为入手，分析其心理状态，以达到正确、全面认识人材的目的。

偏材和常人最易混淆，观察不细，往往分辨不清。为此，他提出两种方法，用以区别“间杂”之人、“依似”之人和偏材之间的界限。

一是“观其夺救以明间杂”<sup>①</sup>。“间杂”之人，善恶相混，表现为恶情夺正或者善情救恶，没有纯正的善良品质，如从表现观察，会产生“若然而不然”的现象，这种人与“一至”的偏材之人相异，是无恒之人。

二是“观其所由以辨依似”<sup>②</sup>。由于人的感情、言行受人主观意识的制约，有些人就用表面现象掩饰其本质，给鉴识人材造成极大困难。“依似”之人，徒有善的表象而无其实质，因其某些表象与偏材相似，若不深入观察剖析，就会将“依似”之人误为人材；反之也会将偏材视为乱德的“依似”之人。比如：“直而好讦者，偏也；讦而不直者，依也”。正直的人，嫉恶如仇，而好攻击他人，称为“偏”；专门攻击善者的人，称为“依”。两者皆有“讦”的表象，但实质截然不同，前者“似非而是”，后者“似是而非”。刘劭认为，必须认真观察，找出“其所以为”，才能分辨出两者不同的本质。

“八观”的其他方法还有：“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从人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之中，把握其固有的品质；“观其志质，以知其名”，从人的气质上去判断其性格特点以及将来可能成就的事

① ② 《人物志·八观》。